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阐释与意义

李莹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奋斗史, 始终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经过长期理论与实践探索, 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与以往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突出亮点: 其一, 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现代化的模板, 而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 其二, 它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翻版, 而吸纳了“市场经济”的鲜活力量; 其三, 它不是重蹈国强必霸的再版, 而展现出“和平友好”的复兴姿态。在21世纪“现代化剧本”的舞台上, 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方案、智慧和力量, 为人类贡献了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A 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1)04-0386-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1.04.014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ignificance

LI Yi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the long-cherished wish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runs through all historical period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ver a century. After long and arduous efforts and exploration, we have opened up a new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journey towards socialistic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road has highlight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modernization model. First, it does not copy the template of western capital modernization but follows the “people-centered” logic of development; Second, it does not copy the former Soviet model but gains fresh power from “market economy”; Third, it does not reprint the national hegemony but adopts the revival posture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On the stage of “modernization script”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firmly “gone its own way” plan, shown its wisdom and strength, and contributed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to mankind.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全景式回顾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辉煌历程, 系统梳理了中国道路一脉相

承的形成发展史, 首次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庄严宣告: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收稿日期: 2021-09-23

作者简介: 李莹(1991-), 男, 讲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人学。E-mail: 1345866238@qq.com

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迈步“新的赶考之路”，我们只有从学理上“抓住事物的根本”^[1]，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论断的内涵特质，才能昂扬斗志、凝聚力量，增强理论自觉、实践自信，奋勇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阔步进军。

一、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的探索进程

“现代化”是“通用而意义不明的表达”^[2]，广义上表征的是人类社会作为“总体性范畴”更迭跃迁的趋势走向，狭义上主要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以世界从孤立隔绝走向交织联系的角度看，率先步入现代化行列的是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工业革命席卷全球，现代化逐渐成为世界性风暴浪潮，造成“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的结果。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探索，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相较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足足晚了三个世纪之久才缓慢开启现代化进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愿景，做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抗争，但都归于失败。艰难的探索呼唤真正能扛举起现代化大旗的时代勇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增强了“它同中国人民命运、同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内在逻辑关系认知的自觉”^[5]，明确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写在了自己实现现代化的纲领上。为现代化准备先决条件和前提基础的是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期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认为，中国若要摆脱贫困、发展实业、增加富力，必须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是较早从社会制度上对现代化的考虑。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分析时局困难时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就

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6]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立即将工业化提上了日程，一来是希望以此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二来是想借此解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渡的问题。因此，确立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一化”是主体，是目的，被放在优先的首位。随着党对现代化认识的转变，“一化”的内容逐渐扩展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7]，这是党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此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从战略上加强谋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但是“大跃进”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动荡十年，都让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但中国共产党人也由此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更加实事求是。总的说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现代化成果、成就，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思想武装、制度条件和物质基础。

其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的中国奇迹，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注入了蓬勃活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肇始，现代化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朝着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确轨道行进。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一是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9]。这是社会性质上对现代化作出的质的规定，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走不得。二是定位了现代化发展阶段问题。认清中国具体国情，乃是如何建设现代化的总依据。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解决途径等作了系统性阐述。三是强化了生产力标准，从功能上揭示了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0]。四是独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10]。这是从大众化、中国化的角度对现代化作出的形象表达，把古已有之的人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与现代化的目标贯通了起来。20世

纪末21世纪初,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沿着邓小平同志为现代化蓝图勾勒的“四梁八柱”继续深入推进。比如在战略上,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为“新三步走”战略,十七大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式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比如在内容上,从十三大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到十四大的“三位一体”,再到十七大的“四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在不断完善。总结而言,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现代化事业不断蓬勃发展,也为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指明了方向。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为“亮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更为主动的自信底气。“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不应该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1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领导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伟大变革:我们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塑就了立体的国家经济布局,建立了完备的国民经济形态,形成了合理的现代经济秩序,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奇迹。我们的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全球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现行联合国标准下7亿多人口全部脱贫,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些成就,标刻了现代化里程碑的新高度,也是我们乘胜追击“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更为成熟的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现代化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这种设计,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了,比原先的计划提前了15年;二是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升了,把原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把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提高了,在原先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规划中,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现代化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一种世界性的风暴浪潮。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现代化”道路,不可避免地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创举,属于“中国式”道路,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特殊版本,带有鲜明的中国烙印;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新”道路,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也与西式现代化的唯资本是从截然不同。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式”特殊版本、人类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有机统一。它吸收借鉴了各式现代化模式的特点和优点,并且根据自身国情和制度进行了新的整合创造,具有了新的内容与形式、结构与特点。可以说,“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壮大的道路与众不同”^[12],展现出的“新”内涵可以概括如下。

(一) 超越资本逻辑宰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

资本主义开启并主导的现代化业已成为蔚为壮观的世界级景象,而资本则是形塑现代化的物质力量。可以说,一部现代化的形成发展史,无不是一部资本到处落户、四处安家的历史,其所到之处,势必“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然而,“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13]却成为天方夜谭,资本主义鼓吹的“人本神话”反转成一系列资本对人宰制的二律背反,最终导致人的畸形发展,以牺牲个体的全面发展来造就整个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

西方现代化表象的种种危机,“催促着人们正视启蒙理性自身的内在矛盾”^[14]。马克思同样看到了弊端,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导致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残酷现实,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实际上,“对资本总体性的考察实质上是对

现代性总体性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是资本批判”^[1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文明作用给予了“最高的褒奖”，也揭露了资本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得出了其必然会面临“剥夺者被剥夺”“丧钟敲响”“外壳炸毁”的覆灭命运的结论。晚年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道路问题时，并不认为资本主导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出路，反对把“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4]。

马克思主义将要创造的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6]的未来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因此，重蹈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覆辙是不可能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7]。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是全体人民共建、共有、共治、共享的，人民是现代化历史舞台上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主要矛盾转变的新论断，更是从新的历史方位上瞄准了制约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的是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这里强调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绝不是对物的现代化的否定，而是建立在物的现代化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现代化，“不是取消而是保存、不是抛弃而是继承以往人类社会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18]的现代化。而真正集中体现新道路人民立场本质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9]，“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19]，不是简单“一刀切”的“均贫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夜暴富”，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需要容忍程度上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彰显的共同富裕观，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兼顾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二）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窠臼，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以“两个必然”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铁的必然性”，却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建议和劝导的使命”^[16]。苏联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开始

了现代化的探索。列宁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使国家经济得到恢复，政治发展稳定，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呈现一片欣荣景象。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党和人民经过多年奋斗，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囿于历史和体制的局限，“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9]，最终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毁灭性灾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仿照苏联，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战略，但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警醒我们必须走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如果用简单公式来描述的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重工业优先+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全能主义”，“以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作为推动社会经济改造与发展的强大杠杆”^[3]，彻底否定资本和市场的作用：凡是私有产权不能搞，凡是市场经济不能搞，凡是雇佣剥削不能搞。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改变了以往只有计划体制才能发展现代化的思路，达到了“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20]。难道事实只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21]那样简单吗？情况并不尽然。第一，我们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也没有忽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始终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第二，经济因素固然是现代化的主场，但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涵盖多领域的整体性概念，“五位一体”总布局正是其全面性的鲜明体现。第三，市场盘活了“物”，让资本、技术、管理、劳动、知识等一切有效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更活络了“人”，“把人民大众从其自身发展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22]，从而现代化“把每个人、每个家庭、各方面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结合起来了”^[23]，与每个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第四，市场有“资”“社”之分，但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包容的，吸收的是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24]。

（三）摒弃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和平理念

纵观世界主要大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图谱，国强必霸成了奉行的普世法则，鲜有国家能摆脱这“循环怪圈”。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图谋霸王乐此不疲？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扩张本性。为了倾销商品、掠夺市场、抢占资源，扩张范围必将走出国家民族

的边界而流窜世界,而只有在政治上独占鳌头,才能为资本积累开疆拓土,“财产的永不休止的积累必须基于权力的永不休止的积累……”^[25]。循此逻辑,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崛起,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会觊觎争霸呢?比如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就在不断制造中国向霸主地位发起挑战的雄心,认为“中国正成为搅乱世界格局的一大因素”^[26]。事实胜于雄辩!西方逻辑得出的西方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会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崛起之路,绝不接受任何欲加之罪的随意裁剪和揣测。

时至今日,中国选择了什么样的现代化崛起之路,已经有目共睹、天下昭然——这是一条新的和平振兴之路。这种“新”有其深刻的理论、历史、文化和现实逻辑。从理论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追求全人类解放,抗争的正是资本对人生存境遇的霸凌,提出工人在争得民主后的“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28],而毛泽东也一再强调,“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29]。从历史看,中国向来没有称雄争霸的传统,“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大国风范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30]形成了强烈反差,而近代中国饱受蹂躏的苦难史,更是时刻警示国人珍贵和平的来之不易。从文化看,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度,中国人是和谐万邦的民族,儒家倡导的天下观,素以“天下一家”“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浸润在中国人的血脉和基因里。从现实看,中国共产党自执政至今,一直在倡导、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来没有恃强凌弱,对外发动军事行动的先例,甚至面对屡屡犯境的反华颠覆活动,也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忍耐和定力,不随意诉诸武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也愿意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谱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念兹在兹的宏伟事业,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翘首以盼、戮力同心的一致心愿,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世界现代化进步史、人类文明跃迁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独树一帜的深刻意义。

第一,就中华民族复兴史的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了中国开始步入强起来的伟大征

程,不可扭转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回首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中国之所以受尽冷眼与曲折,关键原因就在于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一再错失与世界现代化潮流碰撞交错的大好机遇。尽管各派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都未能最终改变国家贫弱的苦难现实。历史和现实以不可驳斥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扛鼎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脊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民族独立的前提基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抬起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在富起来的道路上继续追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小康,阔步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今天的中国,站在“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洪流中,谋划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就世界现代化进步史的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增添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粉碎了所谓“现代化=西方化”的所谓公理。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发展方向是确定性的,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一直以来,西式现代化在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怎样的现代化的问题上,占有无可争辩的话语权,他们鼓吹“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将其打造成唯一可供复制粘贴的模板。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与西式现代化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西方走过的路,而是扬弃它的现代性之殇,比如理性膨胀、资本至上、消费异化等,从而以中国自己的方式书写份属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对此,中国的独创性成果如数家珍: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我们创造了生产、生活与生态协奏共鸣的发展路数;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我们不迷信“文明威胁论”,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美美与共”的对话交流;在处理发展问题上,我们的物质文明遵循可持续的共生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样本,将正向成果与负面代价的利害冲突降到最低,创造的成绩举世瞩目。这都说明:“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23]

第三,就人类文明史跃迁的意义而言,中国式

现代化改写了西式现代化国强必霸的法则，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文明多样性的中坚力量。“西方中心论”者固守“文明优越论”，认为欧洲文明才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31]，整个世界的图景不外乎是已经揭示了的“理性”的复写、摄影和反映。中国开辟的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观因素，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了丰厚滋养。随着中国的步步崛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极力构建与全球化、多极化相悖反的中心—边缘格局，而是随着自身力量的强大，愈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面对经济上复苏乏力态势，中国破解了线性进化、梯度发展的西方利益至上理念，崇尚新发展理念，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公平正义、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治理上西方大国的强势挤压，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世界的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面对发展上依附型的权力财富分配格局，中国超越了零和博弈的经济理性、亲疏有别的二分理念，在兼顾义与利中重塑世界利益体系；面对交往上典型的“圈子文化”和“团伙意识”，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划界的同盟关系，倡导“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交往原则。

第四，就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焕发的生机活力，极大提振了世界范围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昭示真理的信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挫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渺茫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一个又一个国家纷纷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径直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厦行将倾倒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顶住了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时间上，我们从物质生活的贫困匮乏迈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从经济版图的边缘位置跃迁到备受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经济的旁观者、参与者成长为全球经济的贡献者、引擎者。在空间上，我们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塑就了立体的国家经济布局，形成了合理的现代经济秩序。正是这些历史性变革、开创性成就，让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以不可驳斥的事实彰显了真理的磅礴伟力，使世界范围

内的两种制度之争向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势转变。

四、结束语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饱含生命力的、处在成长中的新事物，虽然已经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理念方法和经验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业已成熟的固化模式。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地把这条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的新道路走下去，才是我们在今天坚持道路自信应取的明智之举、科学态度和开放胸襟。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19(6):4-24.
- [6]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 王永贵,夏禹.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35-43.
- [13]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7.
- [14] 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6,37(3):41-55.
- [15] 张三元.中国道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J].山东社会科学,2017(6):5-16.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下转第398页)

第一,以学术事务为中心对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进行重塑和优化。大学本质是一个学术组织,学术事务是大学的核心业务,无论是决策结构还是执行结构都应当围绕更好地履行学术事务管理职能来建构。一切与教学、科研相关的事务都应归类为学术事务,诸如教师聘用、职称晋升、福利待遇等相关政策均为学术事务政策,学生入学、毕业等相关政策也是学术事务政策范畴。

第二,真正让教师共享学校学术事务决策权。教师群体是大学内部治理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在涉及事关自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时,教师作为切身利益相关者应当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同时也应当创造和提供更多的渠道,让教师能够在学术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参与为主。参与是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不能将参与就等同于发挥了作用,实实在在影响决策进程及其结果才是参与的目的。

第三,在校院两级层面合理分权,分权的基本原则是事权和实权相匹配。在事务重心向二级学院转移的同时,学校应将权力重心也逐渐向二级学院下沉。在分权的过程中必须有明确的权力界限,权力划分应有依据,形成制度化规定和约束,并保持相对稳定性。同时考虑不同学院在学科布局上的差异,区别对待基础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为主的学院,以调动学院办学积极性、保障学院办学资源供给为改革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 [1] 管培俊.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理念与方法[J]. 探索与争鸣,2018(6):28-31.
- [2] 郭平,黄正夫.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 教育研究,2013,34(7):68-73.
- [3] DE GROOF J, NEAVE G, ŠVEC J.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M].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
- [4] CORSON J J.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derniz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M]. New York: McGraw-Hill,1975.
- [5] 张维迎. 大学的逻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6] AAUP, ACE, AGB. 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B/OL]. [2019-07-15]. <https://www.aaup.org/report/statement-government-colleges-and-universities>.
- [7] BIRNBAUM R. The end of shared governance: looking ahead or looking back [J].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2004(127):5-22.
- [8] DOUGLASS J A. Shared governa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an historical review[EB/OL]. [2019-07-15]. https://academic-senate.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shared_gov_pp_jd_sharedgov_198_1.pdf.
- [9] 赵蓉,张端鸿. 构建大学共同治理体系的探索性研究——以A大学章程建设为例[J]. 复旦教育论坛,2017,15(1):39-46.
- [10] 弗雷德里克·E博德斯顿. 管理今日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M]. 王春春,赵炬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编辑:程爱婕)

(上接第391页)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8] 王虎学.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J]. 学术研究,2018(11):7-12.
- [1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 LANGE O.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36,4(1):53-71.
- [21] 艾芸. 一位海外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专访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郭苏建[J]. 人民论坛,2008(24):30-31.
- [22] 黄高智. 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4] 列宁. 列宁全集(第3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5] ARENDT H. Imperialism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vannovich,1968.
- [26] 陈曙光. 大国复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2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9]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蒋葆英,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31] 周弘.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09(5):37-45.

(编辑:朱渭波)